



“科技·社会·哲学”研究论丛

**M**etaphor, Meaning and Recognition  
Metaphor Research in Analytic Philosophy

# 隐喻、意义与认知

分析哲学视野中的  
隐喻问题研究

陈四海 / 著

非  
外  
借



科学出版社

“科技·社会·哲学”研究论丛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3YJC720004）

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2016-cx-018）

资助出版

河南师范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

Metaphor, Meaning and Recognition

Metaphor Research in Analytic Philosophy

# 隐喻、意义与认知

分析哲学视野中的  
隐喻问题研究

陈四海 著

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隐喻、意义与认知：分析哲学视野中的隐喻问题研究 / 陈四海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4

（科技·社会·哲学研究论丛）

ISBN 978-7-03-060920-5

I. ①隐… II. ①陈… III. ①隐喻-分析哲学-研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052166号

---

丛书策划：刘 溪

责任编辑：刘 溪 张 楠 / 责任校对：韩 杨

责任印制：徐晓晨 / 封面设计：有道文化

编辑部电话：010-64035853

E-mail:houjunlin@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年4月第一版 开本：720×1000 B5

2019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6 3/4

字数：230 000

定价：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 总 序

“‘科技·社会·哲学’研究论丛”是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推出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迄今，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已经有将近四十年的历史。一路走来，筚路蓝缕，实属不易。既需要再度回首，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更需要目光向前，凝心聚力，砥砺前行。

## （一）研究所历史沿革

1982年，新乡师范学院（1985年更名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建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室。1986年9月，自然辩证法研究室转出，成立河南师范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所，下设科技哲学、自然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三个研究室。1994年1月，更名为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简称“研究所”）。2005年9月，研究所入选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8年12月，研究所入选河南省首届高校高端智库联盟理事单位。

研究所平台建设与哲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密不可分。自1984年开始，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山西大学等高校联合招收培养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方向硕士研究生。1994年，研究所获批科技哲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并开始独立招生，是河南省第一个科技哲学硕士点。至今已累计培养硕士研究生298人（含同等学力申请学位人员68人）。这些毕业

生主要就职于高等学校、企业、政府机关等单位，有的成为学界翘楚、知名教授，有的成为公司高管，有的已经走上各级领导岗位。

## 二、目前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所现有专兼职研究人员 25 人，其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11 人、讲师 7 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20 人。2000 年以来，研究所成员共主持承担 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and 70 多项省部级项目，发表 SSCI、CSSCI 来源期刊及更高级别期刊论文 200 多篇，出版学术专著 20 多部。在多年的学科建设过程中，研究所已经凝练出以下四个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

(1) 科技发展规律与科技评价研究方向。主要采用科学计量学研究手段和方法研究科学技术发展的宏观规律、微观结构及运行机制，对科技发展规律与机制做动力学揭示、结构性解析、状态和趋势描述，研究科研绩效评价和科技政策，为科技监测与评价、科技决策与科技管理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证依据。

(2) 科学技术的社会学研究方向。重视我国科技发展的社会动力、社会功能以及科学共同体行为规范的研究，注重从科学发展的外部机制研究转向科学知识生产的内部机制研究，探讨科技的社会生成机制以及科技因素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基本问题及其解决策略。

(3) 科学哲学与科学文化研究方向。既包括科学的元认识论研究，又注重从哲学层面上考察科学、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互动关系，注重反思科学文化内涵的哲学意蕴，关注政策层面的设计和社会实践的考察。

(4) 技术哲学与技术伦理研究方向。密切关注技术发展前沿，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现代技术伦理框架，打通科技伦理与科技立法，在制度层面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关注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以及技术成果转化等问题，为促进我国技术健康发展与产业化提供合理建议。

### 三、丛书出版背景和计划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在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融合成为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发展引发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社会对科技发展干预的诉求日益强烈。因此，有必要从多个视角探析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影响。

近年来，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坚持区域经济与科技、社会发展实践相结合，致力于我国社会发展需要，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当前，研究所正不断增强凝聚力，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使研究工作更有社会效益，更具社会影响力，努力打造中原科技与社会发展智库。在科学出版社刘溪编辑的大力支持下，研究所决定推出河南师范大学“‘科技·社会·哲学’研究论丛”，研究科技与社会互动中产生的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服务于学科内涵建设，也为学科成员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提供一个渠道。

当前，本丛书的出版是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部分学科成员对已有研究工作的总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研究工作的终结，这只是一个新的起点。虽然我们是地方师范大学，隅居一乡（河南新乡），但我们有“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学术梦想、学术热情和社会担当。前行的路就在脚下，我们要勤勉地走下去，以便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

2019年1月

# 序 言

十年前，四海来南京大学随我攻读英美哲学专业博士学位。当他提出以“隐喻”作为论文选题时，我是有些吃惊的。这个话题不要说在国内，就是在国外的当代哲学讨论中，也是边缘化的。印象中，对于它的关注，更多是文学批评界的事情。再说，我自己对这个话题虽有兴趣但缺乏研究，能够给予他的指导也极其有限。然而我一直坚信，人文学科的探究应该是个性化的，探究者的亲切感至关重要。因此，探究的选题也应该尽可能地尊重探究者的自由。四海心性沉着，不浮躁，不虚骄，我相信他的选择不是一时的冲动。果然，后来他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虽然他自己仍觉有欠缺，在我却是相当满意的。

隐喻长期不被哲学家所重视，原因不难理解。在理性主义传统下，哲学被当作追求真理的事业，而隐喻似乎与真理无关，不过是修辞学的一章。这种将真理与隐喻置于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的做法，在尼采那里遭到彻底否定。二十多年前，当我读到尼采“真理即是隐喻”的口号时，便顿感耳目一新，这一口号与我当时沉迷的实用主义精神可谓不谋而合。詹姆斯关于意识结构的中心与过渡的论述，杜威对于人与世界的交互作用的生存论分析，无不透露出隐喻的基本意蕴。当哲学的视角从神目转变为人目，当知识从谋求与大写实在的对应转变为促进人类生存发展的工具时，

隐喻从边缘走入中心，似乎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分析哲学自诞生以来，便一直和科学紧密相关，知识论由此成了分析哲学的轴心。遗憾的是，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仍未改变，在分析哲学的中心地带，主角仍然是认知科学、脑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等科学分支，科学文化与文学文化的鸿沟仍然没有得到填补。这种分裂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对于语言意义的表象主义诠释、对于知识性质的对应论理解密不可分。科学与文学，一边是准确的、清晰的对于世界的再现，另一边是松散的、模糊的主观情绪的表达。知识属于前者，隐喻属于后者。这种语言、知识观是分析哲学的正统主张，但它也受到来自分析哲学内部的严肃挑战，隐喻是这些挑战的重要突破口。四海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清晰展示了隐喻这一论题的由来、演变以及 20 世纪其从文学批评领域延展到分析哲学内部的整个历程。不仅视野开阔，而且细致周详。

四海的大作精彩之处很多，就个人兴趣而言，有两点令我印象深刻：一是他对理查兹思想的阐释。理查兹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四海的阐释使我们看到，他对于语言意义的语境解释、对于文学语境与因果语境的区分、对于感觉中概念渗透的强调，以及对于所喻、能喻相互作用的揭示，无不显现出超越主流哲学的洞见。在理查兹那里，一种哲学范式转换的前景呼之欲出。罗蒂对于分析哲学同侪的失望、对于文学批评家的褒奖、对于数学家形象的贬低以及对于诗人形象的颂扬，在此得到呼应。二是他对分析哲学内部争论的剔抉爬梳。一些原本并不为人熟知的思想资源被发掘了出来。布莱克与戴维森在语义层面的分歧、海西与罗蒂在知识层面的争论，以及认知语言学的新路向、古典隐喻理论的复兴，等等，均向我们展示出分析哲学内部在“隐喻”话题上的张力，增加了人们对于分析哲学内涵丰富性的认识。四海的这些论述读来从容不迫，他的文字和他的为人一样，沉稳、简洁、徐疾有致。



就我接触的范围而言，这是我国学术界有关分析哲学“隐喻”话题的第一个系统研究成果，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我相信，每一个对分析哲学、知识论、隐喻，甚至元哲学感兴趣的人，都会从中有所获益。

是为序。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陈亚军

2019年1月

# 前 言

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在表述他们的哲学思想时都不可避免地要使用隐喻，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到奥古斯丁的“光照说”，从霍布斯的“利维坦”到莱布尼茨的“单子说”。但是，哲学家对隐喻的实际使用与他们对隐喻本身的蔑视和排斥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在传统哲学中，虽然也不乏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给予隐喻极高评价的哲学家，但是对于大部分哲学家而言，隐喻只是表达思想的媒介，是维特根斯坦希望读者登堂入室后就撤掉的“梯子”（这当然也是一个隐喻）。所以正如布莱克（M. Black）所说的，“关注哲学家的隐喻就等于轻视他——这就如同赞扬一名逻辑学家字写得好一样”<sup>①</sup>。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家希望能够通过对自然语言的改造和约束来发现一种单义的、能够准确表达知识与真理的理想语言，在理想语言的阴影下，哲学家对隐喻的蔑视和排斥很大程度上承载着他们对自然语言含混性的不满。在隐喻 / 字面的二元对立语境中，隐喻逐渐蜕变成为一种话语风格修饰品，被禁锢于修辞学的修辞格理论之中，随着 19 世纪古典修辞学的死亡而归于沉寂。隐喻的复兴始于浪漫主义运动，并随着 20 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而重新成为严肃的哲学思考的主题。本书聚焦于 20 世纪以来分析哲学范围内对于隐喻问题的研究，以意义（meaning）和认知（cognition）问题为切入点，一方面希望能够

---

<sup>①</sup> Black M. 1962. *Models and Metapho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5.

借以说明隐喻何以在哲学和科学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另一方面借以映射出 20 世纪后半期英美分析哲学是如何努力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修正的。

## 一、研究主题的厘定

本书以英美分析哲学视野中的隐喻问题为研究对象。英美分析哲学这个限定词的范围相对比较清晰，是在与欧洲大陆哲学相对照的意义上来使用的。20 世纪以来，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都发生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两派哲学家都在不同于传统修辞学的意义上关注和研究隐喻，这就是隐喻在 20 世纪哲学中的全面复兴。但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对隐喻问题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凯泽克斯（C. Cazeaux）指出，“大陆思想更多地谈论隐喻的本体论意蕴，然而分析哲学的说明总是考察的是语言哲学范围内的比喻”<sup>①</sup>。当然，这种比较是表面的，甚至可能是不准确的。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承认由于哲学旨趣和风格的差异，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对隐喻问题的研究有所不同。本书暂以英美分析哲学家关于隐喻的论述为研究对象，偶尔涉及欧洲大陆哲学家对隐喻问题的研究及二者的相互比较。

什么是隐喻（metaphor）的问题，其实并不好回答。隐喻并不是一个界限分明的研究对象，而是一个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论题域，对于不同的哲学家而言，隐喻具有不同的载体，隐喻性也具有不同的标准。我们首先从隐喻的载体和隐喻性的标准两个方面来简单考察一下隐喻在不同哲学家那里所具有的不同定义。

亚里士多德是隐喻研究的开创者，他在《论诗》（《诗学》）中给隐喻下了第一个定义，即“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它物，这个词变成了隐喻，其应用范围包括以属喻种、以种喻属、以种喻种和彼此类比”<sup>②</sup>。亚里士多德相信我们的世界可以自动地分为不同的自然种类（natural kinds），我们语言中的普遍术语与这些自然种类一一相对应。也就是说，每个语词

<sup>①</sup> Cazeaux C. 2007. *Metaphor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4.

<sup>②</sup> 亚里士多德. 1996. *诗学*. 陈中梅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49.

都有自己固定的指示对象，语词和对象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是语言的标准用法，但是，当某个语词偏离固有的指示对象去指示其他事物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隐喻。所以，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隐喻的载体就是语词，隐喻性就来源于语词和世界中的对象固有关系的偏离。这也是此后两千多年间大部分哲学传统中人们对隐喻载体和隐喻性的基本看法。

当代隐喻研究与传统隐喻研究相区分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隐喻载体的变化。从弗雷格开始，语言的整体论观念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人们不再认为语词是自足的意义载体，而认为句子才是基本的意义单元。同分析哲学的这种转变相对应，当代理论家认为隐喻的基本载体是句子而非语词。所以对于大部分分析哲学家而言，隐喻的基本载体是隐喻性陈述（*metaphorical statement*）而非语词。在分析哲学内部，人们对使得隐喻成为隐喻的隐喻性则存在不同的看法。理查兹认为，隐喻是所喻和能喻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所喻和能喻的相互作用则是更一般的意义语境准则的具体体现而已；布莱克认为，隐喻的隐喻性来源于焦点语词意义的变化；戴维森则认为，隐喻的隐喻性来源于这个陈述让我们从关注语言转向关注世界；等等。

利科（*P. Ricoeur*）认为将隐喻的载体从语词转移到句子、将研究领域从修辞学转向语义学仍然是不够的，他认为，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拓展，将隐喻的载体从句子转向话语，从而开创隐喻解释学的新篇章。20世纪80年代之后，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使得我们对隐喻的关注从语言转向抽象的概念层面，甚至转向我们的思维方式，认知语言学认为我们是基于物理的身体构造对世界进行隐喻性的概念化来创造世界的，所以隐喻是我们思维的一种基本机能。利科的解释学和认知语言学极大地拓展了隐喻研究的范围，但也使得隐喻的载体超出了语言的范围，这使得研究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被泛化了。

总之，隐喻是一个充满家族相似性的论题域，每个人都在借其表达自己的观点，有很多时候观点分歧之争往往源于双方对隐喻的不同界定。所

以在这里笔者并不打算简单给出一个隐喻的定义，而是在讨论每个哲学家的具体论述时来加以分析和澄清。用库珀（D. Cooper）的话来说就是，修辞学课堂上老师所教导的关于不同比喻修辞手段之间的区分到文学课堂上则被含糊了，并且对于当代隐喻研究而言，人们不再注重同为比喻的不同修辞手段之间的内部区分，而是注重以隐喻为代表的非字面言谈和其他字面言谈之间的外部区分，所以往往用“隐喻及其他”（metaphor, etc.）来代替<sup>①</sup>，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所讨论对象的复杂性。

## 二、隐喻问题何以在 20 世纪后半期凸显

隐喻在 21 世纪已经成为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然而，哲学家并不一直就对隐喻如此热衷。1955 年，当布莱克试图对隐喻进行重新评价时，他感到相当孤立无援，因为哲学家普遍都对隐喻持敌视和否定态度，“哲学家（尽管他们对语言的兴趣是众所周知的）如此忽视这一主题，所以我必须从文学批评家那里获得帮助”<sup>②</sup>。然而到了 1981 年，M. 约翰逊（M. Johnson）在《隐喻的哲学观》（*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Metaphor*）的导言中就已经指出，“对于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而言，在过去大约十来年间，隐喻研究逐渐成为一种研究某些传统哲学的最基本关注的方法”<sup>③</sup>。隐喻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间一直躲在修辞学的修辞格中，默默无闻，何以在 20 世纪后半期得到凸显呢？从思想的历史线索而言，这种历史转变无疑是以布莱克为代表的隐喻相互作用理论所推动和促成的。但从思想的逻辑线索来看，则是由 20 世纪哲学思想的诸多转变促成的，正是这些转变为隐喻的当代研究提供了思想场域。

与传统哲学相比，20 世纪哲学发生的那些重要转变，是如何推动隐喻从一种边缘的话语现象转变为哲学思考的重要主题呢？有不少哲学家对隐

① 戴维·E. 库珀. 2007. 隐喻. 郭贵春, 安军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0.

② Black M. 1962. *Models and Metapho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5.

③ Johnson M. 1981. Introduction: metaphor in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Johnson M.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Metapho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3.

喻凸显的原因进行了概括，比如，凯泽克斯认为，隐喻的流行有以下几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人文科学中的语言学转向……预先察觉到了我们的语言范畴在将世界区分成可识别的块状（identifiable chunks）过程中的作用”<sup>①</sup>。在康德之前，哲学家往往相信世界本身就自动地分为不同的自然种类。康德认为作为自在之物的世界本身超出了我们的认识范围，我们眼前的现象世界是借由我们的概念区分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并不自动地、永恒不变地在那儿，而是由人类概念的秩序和分类决定的。而隐喻在创造新的概念组合形式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在人类构造世界的过程中应该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二，“自然科学也开始探索这种观念：人类的概念构造了世界，而不仅仅是与一个预先确立的实在相符合”<sup>②</sup>。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背景下，科学知识不再被看作是对世界的客观中立的反思，而是要受到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等多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什么才可以被看作是关于世界的新知识，并不是由客观实在决定的，而是由上述社会因素共同决定的。隐喻在科学概念的创造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人们不再简单地将科学概念的指称对象等同于世界中的实体，而是将其看作人类理智构造的产物的话，那么隐喻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

第三，“20世纪70年代以来，认知科学逐渐意识到概念和理性对身体的依赖性，以及概念化对隐喻和象征的依赖性”<sup>③</sup>。人们不再相信认知过程是与身体环境无关的纯粹符号化的过程。作为认知科学的一部分的认知语言学更是把隐喻作为一种从我们物理的存在中产生出思想和概念的基本的机制。

第四，“隐喻的流行在对那些因……现代和后现代思想之间的张力而产生出来的界限的质疑中也很显而易见”<sup>④</sup>。后现代思想对现代思想的普遍

① Cazeaux C. 2007. *Metaphor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1.

② Cazeaux C. 2007. *Metaphor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2.

③ Cazeaux C. 2007. *Metaphor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2.

④ Cazeaux C. 2007. *Metaphor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3.

主义进行了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后现代思想用认识论概念的隐喻性起源否定现代思想所追求的客观性，以证明知识的偶然性、社会性等。

凯泽克斯对隐喻兴起原因的概括既包含了 20 世纪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一些共同的时代背景，比如前面三条，同时还包含有一些欧洲大陆比较典型的哲学思潮，比如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对隐喻的流行和凸显所起的作用。除了上述思想的转变，导致隐喻在 20 世纪后半期得到凸显的最重要的历史因素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破产。逻辑实证主义区分了认知意义和情感意义，把形而上学和文学作为只具有情感意义的话语排除出知识领域。在这个过程中，逻辑实证主义者甚至根本不屑于对隐喻进行点名批评，与他们急于摧毁的传统形而上学相比，隐喻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隐喻研究中，哲学家无一例外地把矛头指向了逻辑实证主义。我们基于某种标准，认为某一堆东西毫无用处，就把它们丢掉了，其中或许有些细微的东西我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但是，假如有人后来主张这个细微的东西其实有大用途，那么他需要做的就是证明我们当初判断这堆东西无用的标准其实出了问题。隐喻就是这样，当逻辑实证主义者在证实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意义理论，从而发起涤清传统形而上学的革命运动时，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隐喻，但是到了 20 世纪后半期，当人们试图重新拾回逻辑实证主义者所丢弃的部分内容时，就需要对当初判断这些东西无用的标准进行反思。逻辑实证主义的破产既是隐喻在英美分析哲学中得到凸显的最重要的历史原因，也是借由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一个重要基点。

### 三、分析哲学隐喻研究的发展历程

在从亚里士多德到逻辑实证主义这两千多年间，隐喻大部分时候都处在“理想语言”或“字面真理范式”的阴影之下，隐喻被当作是单纯的话语风格修饰品，仅具有审美价值，与严肃的哲学及科学思考没有任何关系。

20世纪后半期，分析哲学家对实证主义的“字面真理范式”发起了挑战，从而改变了隐喻的历史命运，“隐喻不再被限定于狭隘理解的审美领域，人们逐渐承认它对于任何关于语言的充分说明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有些人认为它在认识论甚至形而上学中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sup>①</sup>。除了分析哲学，欧洲大陆的现象学传统也对隐喻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估。我们主要关注在当代的英美分析哲学中，这种历史转变是如何完成的。

其实，第一次试图改变隐喻命运的努力是由文学批评家理查兹（I. A. Richards）在20世纪30年代做出的。理查兹试图用浪漫主义去修正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理查兹在《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1936年）一书中用“意义的语境准则”取代了“固有意义迷信”，从而开创了隐喻的相互作用理论，这是隐喻当代研究的逻辑起点。但理查兹的非专业哲学家身份和20世纪30年代浓烈的实证主义氛围使得理查兹所提出来的相互作用理论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破产和日常语言学派的兴起，隐喻研究的时代氛围得到了极大的改善。1955年，布莱克发表论文《隐喻》（*Metaphor*），在对传统隐喻观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成功地重新发现和挖掘了理查兹的隐喻相互作用理论。布莱克用日常语言哲学消除了理查兹浪漫主义的神秘因素，更为清楚地说明了隐喻对意义的创造作用以及隐喻的认知价值。布莱克的鲜明主张极大地吸引了当代分析哲学的关注目光，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隐喻研究浪潮，实现了隐喻当代研究和传统观点的彻底决裂。比尔兹利（M. C. Beardsley）在《美学》（*Aesthetics*, 1958年）、古德曼（N. Goodman）在《艺术的语言》（*Language of Art*, 1968年）、利科在《活的隐喻》（*La Metaphore Vive*, 1978年）、海西（M. Hesse）在《实在的构造》（*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1986年）等书中都肯定和声援了布莱克的隐喻相互作用理论。

<sup>①</sup> Johnson M. 1981. Introduction: metaphor in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Johnson M.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Metapho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3.



相互作用理论的历史贡献在于它旗帜鲜明地肯定了隐喻对意义的创造作用以及隐喻的认知价值，从而最大限度地聚焦了学术界的关注目光。但相互作用理论试图在语义学范围内来说明隐喻的方案也逐渐暴露出其理论上的缺陷和不足之处。1978年，戴维森发表《隐喻的含义》(*What metaphors mean*)一文，对布莱克的相互作用理论发起了挑战，戴维森否认隐喻意义的存在，并且否认隐喻具有认知价值。戴维森认为隐喻仅仅具有字面意义，隐喻并不是语义层面的意义更新而是语用层面所产生的特殊效果，学界一般把这种否定隐喻研究的语义学进路、否定隐喻意义存在的观点称为隐喻的字面主义理论。字面主义理论试图将隐喻研究的场域从语义学转移到语用学，从而给予隐喻更充分的说明。戴维森的观点也得到了其他哲学家的回应，塞尔(J. Searle)在《表达和意义》(*Expression and Meaning*, 1979年)中基于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自己反对隐喻意义的论证，罗蒂(R. Rorty)在《偶然、反讽与团结》(*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1989年)中论证了隐喻的非语言性和非认知性。

相互作用理论的语义学方案和字面主义理论的语用学方案围绕着隐喻意义是否存在和隐喻是否具有认知性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其中有两场大的争论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场就是布莱克和戴维森围绕着“是否存在隐喻意义”所展开的争论；第二场就是海西和罗蒂围绕着“隐喻是否具有认知价值”所展开的争论。在这两场争论中，虽然双方彼此针锋相对，谁也不能说服对方，但他们还是就隐喻当代研究同传统观点的差别达成了一些共识，相互作用理论和字面主义理论都承认隐喻在思辨性的哲学话语及技术性的科学话语中是必不可少的。这两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分析哲学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和知识理论的两种不同修正方案。

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隐喻的研究从基于少数隐喻实例进行概念和理论分析转向了基于丰富的语料进行语义分析的阶段。这一阶段最突出的成果就是莱考夫(G. Lakoff)和M. 约翰逊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 1980年)，这是认知语言学的开山之作，同